

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

霍彦儒 主编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 / 霍彦儒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80736 - 816 - 8

I. ①炎… II. ①霍… III. ①炎帝—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远古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27 = 1②K210. 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623 号

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

宝鸡炎帝研究会

霍彦儒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5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36 - 816 - 8
定 价 65.00 元

网 址 WWW. sqcbs. com

关于中华文化的源与流及有关问题

(代序)

张岂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年来有很大进展，其中包括宝鸡炎帝研究会在炎帝文化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如完成了《陕西省志·炎帝志》，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等。

宝鸡地区是重要的中国文化摇篮之一，也是炎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炎帝文化研究中，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角度展开科学探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文化建设的春天已经到来，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作为祖国历史文化学术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深感我们文化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关键是要把握好时代的脉搏，使我们的文化研究更有深度和广度。在工作实践中，我觉得有些关于文化的大问题需要文化工作者们共同研究，并将它们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

这里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向与会同志们请教。

一、关于中华文化源与流的研究

谈到中华文化，大家公认的一个提法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如果忽略甚至否定中华文化的“源”，那就无从阐述她的“流”；如果忽略她的“流”，就看不到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我们研究姜炎文化，就是为了更好地阐述中华文化的“源”，这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从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发展中更加深刻地阐述她的丰富内涵。

在揭示姜炎文化“源”的价值的时候，注意姜炎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

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这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已有明确的关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认识，但不能忽视炎黄文化在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这些方面的研究肯定会进一步加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土著民族，都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追溯到两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点与西方很多国家不同。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的。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也是中国 56 个民族及其祖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其中汉族居于主导地位，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基于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中央明确地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主张。2009 年 7 月 11 ~ 12 日，在长沙召开的第五届“国共论坛”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强调加强两岸文化产业发展合作的必要性。2009 年 7 月 22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八条建议。由此可以看出，被很多国家称之为 21 世纪“朝阳产业”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此次宝鸡的学术论坛，叫做“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既然将文化与“民生”挂钩，文化产业就不可不谈。

我个人的浅见是：我们既要认识文化产业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出现的新兴产业，欢迎它，规范它，发展它，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区别。学术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它代表着民族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承担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造的使命，学术研究活动所体现的是对文化发展的责任、良知和使命，学术研究本身不是产业，例如宝鸡炎帝研究会编撰的《陕西省志·炎帝志》，这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本质在于求真，在于弘扬祖国优秀

文化。而文化产业则是文化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产物；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市场需求与利益驱动。如果用一两句话归纳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在价值趋向上，学术研究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提升，而文化产业则着重于满足市场的需求与利益；在调节机制上，学术研究的推动主要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以市场的利益为取舍尺度，文化产业则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看到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联系，这表现在：文化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文化产品能否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取决于文化产品的质量与价值趋向，因此，文化产业应当尊重和借鉴学术研究的某些成果，需要学术研究成果的指导与支撑。同样，学术研究的某些成果也需要通过文化市场加以推广，使整个社会受益。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化市场化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普及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不至于在文化市场面前丧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也不至于在注重市场需求的同时而忽略文化产品的质量与深度。如果文化产业单纯注重市场需求，只注意娱乐效果，忽视内在的价值含量，那不仅会毁坏文化产业本身，而且会给社会带来负作用。

在宝鸡市召开学术研讨会，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弄清楚，也许有此必要。具体言之，宝鸡市的政府部门和文化产业部门以及学术研究人员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这就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开展关于文化与文物的学术研究，这要靠政府投资；积极发展符合地区经济文化需要的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之开展需要有学术研究人员与文物工作者做参谋、进行应有的指导。这三方面关系协调好，整合好，宝鸡地区的旅游业才能蒸蒸日上，更加重要的是，此地区的文化与民生将会大幅度提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除以上的一些建议外，我还想着重提一句：应十分注意生态文明建设。宝鸡地区凤翔发生的儿童中铅事件，引起全国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教训。

本次研讨会代表来源广泛，分别有北京、天津、河南、山东、广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河北、浙江、安徽、甘肃、陕西等二十多个省市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6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论坛，共收到论文 56 篇，先后有 50 多名代表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发言。从所收论文来看，涉及炎帝·姜炎文化的多个方面，主题突出，观点鲜明，新论迭出，

尤其是结合炎帝功绩、炎帝精神，对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等问题发表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说，虽则一二次论坛会，不会解决多个问题，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论坛，相互切磋，各抒己见，会有利于我们认识的提高和思维的改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通过这次论坛，无疑会对发展宝鸡旅游文化产业，促进宝鸡民生建设，扩大宝鸡国内外影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题目为编者所加。本文为作者在2009年“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上的书面发言。）

2010年4月1日

在了解考古学进展基础上 推进姜炎文化研究

(代序)

李伯谦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姜炎文化与民生。民生是永恒的主题，不管是个人、团体还是政党，如果不把民生放在首位，不关心人民疾苦，老百姓生活过不好，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不行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只有把民生放在首要地位，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兴旺发达。今天召开这次研讨会，目的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从姜炎文化中汲取营养，讨论如何更好的促进民生建设。

我一辈子从事商周考古研究，这几年也开始关注炎黄文化，因为炎黄文化关系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前年，我在长沙召开的炎黄文化研讨会上作过一个演讲，题目是《考古学视野下的三皇五帝时代》，其中对炎帝神农氏做了很高的评价。三皇五帝是战国时人们构建的中国古史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兴起、发展与神农氏发明农业至关重要。这符合当时实际的论断。我们研究姜炎文化，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发展的眼光，不仅要了解传说中的三皇时代，也应该知道五帝时代以及更后的历史，这样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姜炎文化的意义。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简要汇报一下建国 60 年来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看似和这次会议的主题有点远，但从我刚才说的看，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最近我写了篇文章，摘要发表在 2009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报·理论版》，题目为《追寻从未间断的中国文化——新中国考古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考古学发展迅速，收获很大，至少取得了五个方

面的重大成果。

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其发展谱系

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系列的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其发展谱系，说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有百万年的根系，一万年的文明起步，5000年的文明古国，2000年的帝国。

旧石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山顶洞人、北京猿人。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演进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根系。目前，在我国已发现古人类旧石器遗址有100多处，而且从早期、中期到晚期，没有任何缺环。

研究人类起源的学者，多主张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大陆，然后才搬迁到其他地区。有人认为，第一批来中国的古人到距今10万年左右时，就消失了。随后又有一批来自非洲的古人到了中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但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没有断裂，认为中国人是外来的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新石器文化，过去我们只知道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建国60年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已有几百种，全国各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如，宝鸡的北首岭遗址，就是比仰韶文化还要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此外宝鸡还有更早的关桃园文化。

苏秉琦先生把距今7000年至8000年到5000年前后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认为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谱系，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他根据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不同，分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相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六大区系。每个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各自孕育产生出文明因素。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必须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

对于青铜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安阳小屯殷墟、益都苏阜屯、宝鸡斗鸡台、扶风、岐山的周原等为数不多的重要商周遗址，而如今又科学勘察和

发掘出夏时期的偃师二里头、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广汉三星堆以及西周时期的岐山周公庙、洛阳北窑、北京房山琉璃河、曲沃曲村等众多青铜器时代遗址。建立了中国青铜器时代比较完备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廓清了各文化的源流及其关系，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准备了条件。

宝鸡是周人老家，周原是古公亶父到文王迁来前居住的地方，周公庙是周公采邑。后来的秦国也在这里崛起。

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复原、重建，准备了资料条件。

二、提出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地一体模式

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是建立在从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器时代乃至以后文化的连续发展基础之上的。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文明因素逐渐孕育，当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在70~80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基本上赞同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青铜器都是外来的。

在中国现在国土范围之内，六大新石器文化区系，各有发明创造，发展并不平衡。从文明因素的起源来说，是多源的。文明因素起源以后，通过交流融合，逐步向一起汇聚，至少到夏代已由多源融汇成一体。这个一体又逐步扩大，像滚雪球一样，延续发展。

三、经过60年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国家，考古学界称为“古国”。苏秉琦先生认为，大体处在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段，古国酝酿、开始形成，并成为“凌驾于部落之上的实体”。古国的特征是神权为主，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个阶段被称为“万国”，又叫“万邦”，相当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时代。古国不同于部落。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一般以崇尚神权为特征，是神权国家，这在

“红山古国”、“良渚古国”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从距今 450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是方国阶段，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方国阶段的特征是王权为主，王权、军权结合，方国已是王权国家，神权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当时中国大地有很多这样的方国。

帝国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满清灭亡。我所理解的帝国的特征是，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帝国是制度国家，要受各种制度的约束，不是国王通过占卜就可随意作为的。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古国阶段可能并不简单，有以神权为中心的崇拜神灵的“红山古国”、“良渚古国”，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对社会财富极度消耗，盛极一时，但却难以为继。而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相同规模的大墓里，只发现有 1~2 件玉器，而不见用于祭祀的璧、琮等一类玉器。他们的部族是以中原地区祖先的崇拜为主的“仰韶古国”，包括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在内，没有那么奢华，创造的社会财富能继承下来、维持社会发展，没有断掉，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道路，走在了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四、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中国上古史，以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构建而成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几千年来可谓根深蒂固。上世纪 20 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兴起了“古史辨”思潮，对旧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人们对这个体系发生动摇，不太相信。从考古发现客观地看，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基本格局还是站得住的。

中国考古学自 1928 年从西方引进后的八十一年来成绩巨大。关于商代文化，晚期的找到了安阳殷墟，证明此地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早期发现了郑州商城，是商朝开国之君商汤所建的亳都，从而将商朝由传说史变成了信史。

关于商朝之前的夏文化，考古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认为是夏代最后的王——桀都斟寻，发现了夏文化早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证明是禹都阳城所在地。这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周文化考古发现的成果更多。通过对周原、丰镐、成周、周公采邑以及齐、鲁、滕、薛、虢、应、燕、晋、芮、邢、郑、蔡、秦、楚、徐、黄、钟离、吴、越等宗周和封国的都邑或墓葬遗迹的发掘，学术界对西周王朝更是刮目相看，认识早已超越了文献材料之上，基本理清了各自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其社会结构、礼制、文化的面貌。特别值得一提的，宝鸡周公庙出土的先周甲骨，有许多人名、地名，周人的祖先出现了好几个，如，太王、王季、文王。过去人们认为，周人早期的历史是周人编造的，靠不住。通过几十年考古研究，夏商周三代上古史已经很清晰的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通过考古发现证实的以夏、商、周为核心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使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有了基本清楚的认识，证明了中国的上古史已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可信的历史了。

五、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展示出中国古代高超的文明成果

为什么社会会一步一步发展过来，这是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经济技术进步分不开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技术的发展。60年来，中国考古学既未局限于艺术史考古，也未单纯侧重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济技术领域考古，其中就有农业发明、就有炎帝神农氏的功劳。

在农业考古方面，确认了中国不仅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同时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过去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因为在云南与印度相近的地方，考古发现了野生稻。距今9000年前后，甚至更早，考古又发现了由野生稻培育驯化成的栽培稻的实物。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000年前后正在培育的稻谷，长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后许多遗址都有稻谷，甚至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稻田。我以为这是神农氏传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是不会产生神农氏的传说的。

在冶金考古方面，仰韶文化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发现有黄铜器，龙山时代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区发现有红铜器，夏代开始，青铜器的发现已几乎

遍布黄河、长江及北方广大地区，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发展水平高而且又有自己特点的地区；商代发现有陨铁，西周晚期发现有块炼铁，春秋发现有铸铁，证明中国是铸铁发明最早的国家。铁的发现，中国不是最早，铸铁却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只有铸铁发明后才能铸造更多的东西。在陶瓷考古方面，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处距今一万年陶片的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最早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定居农业的证明。

距今 4000 年前原始瓷器的出土和西周烧制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则以更充分的根据证实中国的确是瓷器的故乡。首先是硬陶，然后上釉，釉不是特别纯，但它是原始瓷器，毕竟与陶器不同。除此之外，在制漆、织染、造纸、机械等领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也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六、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

中国文化、文明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环境中孤立进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的交流，既有对外的传播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作为典型事例的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东传及其汉化过程，生动地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排外的文化，它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融合重组不断发展壮大，以求生生不息。

以上只是说了一个大概，但仅从这简单的概括来看，已足以证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辉煌。特别是它的绵延不绝，不曾间断。这其中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其中就包括姜炎文化、神农氏的功绩。好好总结，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开幕式上的学术演讲。由王宏波根据录音整理，后经本人审定。）

目 录

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图腾与炎帝彤鱼氏	
——兼论炎帝名号的由来	曹定云 (1)
炎帝神农氏的创造发明与民生	王宇信 (10)
三皇五帝的时代与考古学上的年代	王震中 (17)
关于炎帝及其文化的再思考	刘 敏 (27)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炎帝神农其人	孟祥才 (31)
炎帝的身世渊源与活动时间考	杨生民 (41)
立足于中华文明形成的轨迹看炎帝	方 铭 (44)
关桃园出土骨耜与炎帝耜耕农业论	徐日辉 (49)
汉代人笔下的炎帝神农氏	薛瑞泽 (54)
“先农”与“神农炎帝”	
——以里耶、周家台秦简为中心的讨论	宋 超 (60)
龙凤——凝聚炎黄子孙的图腾	彭 曦 (71)
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姜”、“姬”等女字部首姓氏的产生背景	高 凯 (77)
“炎黄认同”与“大一统”政治价值观的理论建构	
——以“炎帝”身份转换和“大一统”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夏增民 (89)
炎帝与中华文化的创新	潘俊杰 (99)
炎帝——羌人文化融入并改良华夏文化	萧 兵 (106)
再论炎帝神农氏	宫长为 (110)
姜姓列国分布变迁考	吕文郁 (112)
略说黄帝铸鼎与炎帝造琴	张 翀 (113)
申论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之关系	王贵民 (114)
秦陇地方的姜炎文化纪念遗存	王子今 (127)
炎帝文化及其渊源问题	郑 光 (133)

三论姜炎文化	霍彦儒 (152)
“连山易”文献辑要辨证	周延良 (155)
从古代诗歌管窥炎帝文化的若干问题	陈战峰 (168)
炎帝、姜炎文化略论	彭邦本 (179)
略论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	蒋南华 (188)
炎帝族系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中的贡献	程有为 (195)
炎帝与中华科技文明和科学传统	王星光 (203)
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因	吴小强 (212)
炎黄时代的饮食生活	王仁湘 (216)
羌文化: 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李德书 (223)
炎帝故里话民俗	刘芳 (228)
炎黄文化的十大文化认同表现	葛祥邻 (234)
炎黄二帝与华夏族的形成	任崇岳 (240)
炎帝与中华民族	高 强 (247)
炎帝与中华姓氏	张海瀛 (254)
炎帝、黄帝与华夏族的形成	沈长云 (259)
找回失落的炎帝精神	王 磊 (260)
炎帝——倾情造福民生的万世楷模	陈德辉 (265)
弘扬炎黄文化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吕书臣 (276)
发掘炎帝农业文化内涵 打造生态农业旅游品牌	刘明科 (282)
传承姜炎文化 建设文化宝鸡	任登第 牛淑卿 (291)
从炎黄文化论台湾的开发与台湾的根	郭展礼 (296)
姜炎文化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例证	
——从2008北京奥运到2009台北“听奥”	查重传 张钊嘉 (297)
两种炎帝观: 科学主义与信仰主义	孔润年 (299)
立峙炎黄二帝的社会意义	王学理 (308)
附录一	
祭炎帝陵文	戴征社 恭读 (309)

附录二

- 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开幕式主持词
 刘桂芳（311）
- 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开幕词 王 才（313）
- 在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开幕式上的欢迎词
 党双忍（316）

附录三

- 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闭幕式主持词
 王 才（317）
- 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闭幕词 龚晓燕（319）

附录四

- 贺信·贺电（321）

附录五

- 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论坛学术总结 宫长为（324）
- 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观点综述 高 强（328）

附录六

- 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出席会议与提交论文
 （提要）人员名单（334）

- 后记（337）

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人面鱼纹” 图腾与炎帝彤鱼氏

——兼论炎帝名号的由来

曹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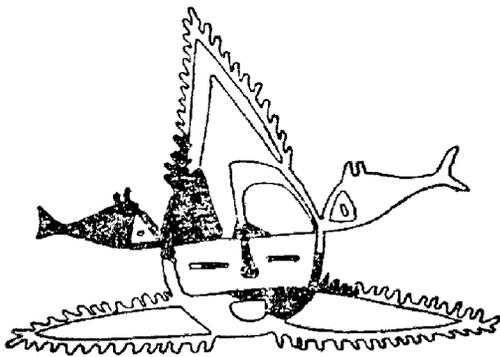
一、“人面鱼纹”图是炎帝部落早期图腾

2006年9月，我首次参加在宝鸡召开的“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炎帝部落早期图腾初探》（以下简称《初探》）^①。我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以下主要观点：

1、炎帝部落所在的时代大约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之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分为两个大的类型，即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这两大类型其内涵有明显的不同：庙底沟类型彩陶以花叶纹为主；而半坡类型彩陶以鱼纹为主。这个区别很重要。正是这一区别为我们寻找炎帝部落创造了条件。

2、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内涵上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内涵基本一致，但在时间上要早于西安半坡。由此可以推断，宝鸡北首岭一带，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发祥地。

3、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彩陶中有大量的各种形式的鱼纹图案。尤其彩陶盆上出现了“人面鱼纹”图（见图一）。这种“人面鱼纹”图在整个文化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应该是该文化居民所崇拜的图腾。



图一：宝鸡北首岭“人面鱼纹”图

^① 《炎帝部落早期图腾初探》，收入霍彦儒主编《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一书中，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4、《古本山海经图说·海内南经》云“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而同书《大荒西经》云“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愬，灵愬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经清代学者王念孙、孙星衍之研究，氏人国就是互人国。氏人是炎帝部落后裔。而氏人是“人面而鱼身”。这种“人面而鱼身”同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图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而且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只不过在时间上有先后罢了。《山海经》中氏人之“人面鱼身”图应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图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先民应属于古代的炎帝部落。

5、宝鸡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发祥地，而根据文献记载，炎帝部落的发祥地也在宝鸡，二者地域相合；而炎帝部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发展时间内，二者时代相合。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有“人面鱼纹”图，而《山海经》中的炎帝后裔一氏人是“人面而鱼身”图，二者内涵相合。由此可以推断：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先民应属于古代的炎帝部落；而“人面鱼纹”图应是炎帝部落早期所崇拜的图腾。

以上是《初探》一文中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二、“人面鱼纹”图是炎帝彤鱼氏的标志

《初探》一文提出了“人面鱼纹”图是炎帝部落的早期图腾。为什么要特意提出是“早期图腾”？而不提出是“中期”或“后期”图腾？这是因为：炎帝部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其后来的文献也不可能把炎帝部落之发展过程全部准确地记录下来，此中还含有我们未知的部分，需要我们今天作出探讨和研究。以往文献一提炎帝就是神农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炎帝”是部落之名，“神农氏”是氏族之名。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不能混淆。“炎帝”部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部落首领——炎帝。“炎帝”部落内部包含有很多的氏族：例如彤鱼氏、神农氏、烈山氏、鱼鳧氏等等。炎帝部落首领究竟出自哪个氏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常说的“炎帝神农氏”，是说此时的炎帝部落首领是出自于炎帝部落内部的神农氏。换言之，是神农氏的族长担任炎帝部落的首领，由他来管理和统领整个炎帝部落。由此可以明白，炎帝和神农氏不是同一个概念，更不是同一个人。

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图，是炎帝部落早期图腾。而此时的炎帝部落的首领究竟是谁呢？按照常理，人们自然会想到“神农氏”。因为，我们现存的文献一谈就是“炎帝神农氏”，视他为华夏的“人文初祖”，他发明农业等等。作为传说，这样说是可以的；但作为历史，尤其是在有考古材料的今天，再这样说，就